·哲学研究·

DOI:10.20004/j.cnki.ujn.2025.06.002

生态解放的元结构图式

——雅克·比岱的生态政治哲学论析

高　泽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雅克·比岱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政治解放的基础上,运用其创立的元结构理论对资本主义展开了生态批判,指出生态危机是一种"终极现代性"危机,而导致生态危机的原因除了元结构中的市场逻辑之外,还存在着组织逻辑。这就需要依循民主逻辑的大众在与资本家、职能者的"三边斗争"中释放解放潜能,把生态斗争与阶级斗争结合起来,让生态运动统合多元社会运动,推动当代社会从"世界-体系"过渡到"世界-国家",而后通过构建"世界-民族"的终极生态共同体,实现生态解放和人类的普遍解放。比岱基于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政治哲学建构,展现出人类走向生态解放的未来图景,也反映了其思想发展的最新动向。

[关键词]比岱;生态政治;元结构;生态解放;世界-民族

[中图分类号]D089;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25)06-0013-10

纵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谱系,雅克·比岱(Jacques Bidet,1935—)可被纳入法国乃至西方理论界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列。比岱曾任法国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主席、《今日马克思》杂志主编、巴黎第十大学哲学系教授,他与巴迪欧、朗西埃和巴里巴尔同属后阿尔都塞时代法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在关于政治解放的问题上提出了重要的主张、观点和设想。尤其是比岱在研究《资本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元结构"(meta-structure)范式,为反思和探讨西方现代性危机、阶级结构、契约关系、解放道路等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对此,国内外学界已展开诸多分析探讨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然而,比岱思想成熟后转向对生态问题的研究及其所取得的学术进展,却尚未引起国内学界的重视。应当指出,比岱思想中这一日益彰显的生态向度,不仅对我们认识其思想发展轨迹具有重要价值,其中关于生态问题的探讨也可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种参考与镜鉴。

回溯比岱的思想发展过程,对全球生态危机的思考是其中一条极为重要且逐渐显现的线索。早在1992年,比岱就曾发表《是否存在一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一文[①],开始尝试构建面向生态解放的激进政治哲学。然而,这一时期比岱的理论探索并不成熟,且远未实现体系化。随着他提出的总体理论与元结构范式不断完善,比岱对生态问题的探讨逐步深入,并展现出愈发鲜明的左翼批判意涵。透过2019年前后他在北京等地参加的包括"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的未来"[②]在内的一系列学术会议所发表的演讲稿,可以看出,一种生态政治哲学理论正在进入快速构建阶

[作者简介]高泽,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箱:263802817@qq.com。

①Jacques B.,Y a-t-il une écologie marxiste? *Actuel Marx*,No. 12,1992,pp. 96-112.

②雅克·比岱,邓佳:《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问题的几点思考》,《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12期。

段。而2021年《大众政治生态学》[①]一书的出版,则标志着比岱对生态政治哲学的阐发已趋于成型。这一新型生态政治哲学理论基于元结构分析范式,对生态解放的现实条件、当代战略以及未来形态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探讨,丰富了人类迈向绿色社会的政治哲学思考。那么,以元结构为底层逻辑,比岱是如何勾勒出一门基于左翼激进立场的生态政治哲学的?根据当今西方社会中的左翼运动现状,他又设想出一种怎样的生态解放战略?可以说,以元结构为蓝本,经由生态政治哲学的理论演绎,比岱已经描绘出当代西方社会颠覆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生态解放的未来远景。

一、生态危机的现实定位

在《大众政治生态学》一书中,比岱提出了这样一个关键命题,即随着人类社会逐渐进入"生态灾难"时代,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当代生态危机的成因与实质?在当今西方新自由主义时代,克服生态危机、走向生态解放的现实条件又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西方理论界莫衷一是,众说纷纭。保罗·霍肯(Paul Hawken)、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等一批当代"绿色资本主义"的鼓吹者认为,生态危机其实与社会制度无关,只是一种由资源过度开发与技术局限所引发的问题。因此,西方国家只需在"绿色资本主义"框架下,推广清洁技术,发挥市场的"灵活"调节作用,便可有效化解这一危机。与此不同,以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杰森·摩尔(Jason Moore)等为代表的当代欧美生态社会主义者则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社会统治形式才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比岱显然认同后一种观点,他基于元结构的理论运演指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危机,其背后所体现的正是人类社会所必须直面的现代性危机,这对理解当代生态危机的深层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一)"元结构"分析范式

在比岱看来,"元结构"既可以作为一种解读现代社会运行逻辑的有效框架,也是其生态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石。只有参照元结构,才能全面把握生态危机发生的原因及其解决方略,明确生态解放的现实条件。

比岱的元结构理论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综合他在不同学术场合的演讲和论著,特别是《现代性理论》(1990)、《总体理论》(1999)、《〈资本论〉的诠释与重构》(2004)、《大众政治生态学》(2021)等一些著作中的观点,以及其多次在中国讲学的内容,可以看到其元结构理论是解释现代社会的形成、结构、运行逻辑以及社会形态发展趋向的一套原则和观点汇集,也是一种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政治哲学理论。其理论主线可以通过从元结构,到国家结构,再到世界结构的概念链条得以表达。概括地说,作为这一体系的逻辑起点,"元结构"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关于"自由、平等、理性"的现代性宣言,是一种"用言语对待每个人和对大家的宣言"[②],它主要通过现代社会的契约关系,包括个体间契约(如合同)和中央契约(即所有个体间、个体与国家的契约,如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及其对应的具体中介,即市场和组织,来规范和支配个体行为和社会的运行。可见,"元结构"主要是由政治合理性的一面,即个体间契约和中央契约这两极,以及经济理性的一面,即市场和组织这两极构成的"双面双极"的辩证统一体,既是生成现代社会结构的前提条件,也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鲜明特征。其中,市场与组织作为两种性质不同的经济协调方式,不存在先后之别,它们是具有同等地位的并列关系,两者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同市场一样,组织也是

①关于该著作中的"大众"一词,在2021年出版的法语原版(*L'écologie politique du commun du peuple*)中,用的是"commun du peuple",有"民众共同体"的含义;在2024年的英译版(*A political ecology of common people*)中,用的是"common people",指向"普通人、平民、大众"等含义,本文将书名译为《大众政治生态学》。

②雅克·比岱著,陈原译:《总体理论》,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产生阶级关系的因素。

比岱指出，以市场与组织为中介，宣称“自由、平等、理性”的元结构会产生倒置效应，转化生成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①]。具体来说，以市场为中介，通过对资本所有权的占有形成了剥削工人、占有剩余价值的资本家；以组织为中介，通过掌握知识能力并获得一定的社会资质成为具有支配被管理者权力的职能者（如企业管理者、行政管理者等）。资本家与职能者构成了两大统治阶级，而具有直接联合潜力的大众则成为被统治阶级，三者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剥削和压迫性质的阶级结构。在这种现代阶级结构中，资本家阶级与职能者阶级、大众阶级之间的“三边斗争”（the three-sided duel）塑型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格局，而大众阶级要以宣称“自由、平等、理性”的元结构宣言为诉求，通过自身联合以及与职能者的跨阶级合作，在反抗资本家阶级的斗争中解放自身。

随之，比岱又将视野越出民族国家，用元结构理论分析沃勒斯坦所研究的“世界-体系”（the World-System）和全球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在比岱看来，在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扩张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蔓延、“元结构”宣言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动，以及民族国家阶级结构层面的矛盾不断发展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市场和组织已突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形成了世界市场和多种多样的世界性组织及区域共同体。这一进程催生了世界资本家阶级与世界职能者阶级，其统治范围不断扩大，由此导致中心、半边缘和边缘国家组成的“世界-体系”向具有超国家组织机构的“世界-国家”（the World-State）转化，现代社会也由此逐步过渡到“终级现代性”（ultimodernity）阶段。“世界-国家”的出现将为世界大众的团结和联合提供条件和机遇，世界大众要在世界性阶级的“三边斗争”中，推翻世界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和排挤，从而形成“世界-民族”（the World-Nation）这一全人类的统一共同体。

比岱认为，他在坚持《资本论》基本思想和方法的前提下，从组织及其与市场关系的角度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元结构”思想，并通过分析现代社会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和阶级斗争的新态势及行动策略，寻求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比岱所做的这些理论研究工作，体现了他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同样，面对全球日益凸显的生态危机，尽管年事已高，比岱仍能运用元结构理论对生态问题进行深入剖析，以期构想一个“终极生态共同体”（the ultimate ecological community），展现出他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社会责任。

（二）生态危机的时代特征

如果要诊断生态危机的时代根源，首先需要辨明当今西方新自由主义社会究竟处于何种历史方位。正如比岱所言，近几十年来诸如“后现代”“后历史”这样一些自诩可以把握今日西方社会“时代脉搏”的新术语、新说法层出不穷，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经典革命理论那种具有原则高度的宏大历史叙事，陷入了“后现代”的思想歧途[②]。与此同时，一批新自由主义卫道士则通过鼓吹“历史终结论”“政治阶段论”，试图确证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这些思想变体不仅影响了人们对西方社会所处时代的定位，而且也严重干扰了西方社会对生态危机实质的解读，甚至使得今日西方社会深陷“绿色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迷雾。

依据元结构理论，“现代世界（‘体系’）和现代社会（‘结构’）之所以区别于传统世界和传统社会，是因为它以自由、平等和理性的现代宣言作为自己的本质依据与原则纲要”[③]。针对生态危机所处时代背景的不同理解，比岱指出，当今西方世界仍然是元结构支配下的现代社会，并没有进入某种“后现代”性质的社会。这意味着，生态危机仍然属于一种现代性危机，我们应当坚持在现代性批判的语境下，反思当代生态危机的成因与实质。同时，也应当看到，随着现代社会由“世界-体系”逐

①参见周凡：《元结构与现代性：比岱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5期。

②See Jacques B. ，*Le néolibéralisme : un autre grand récit*，Paris：Les prairies ordinaires，2016，p. 11.

③王一成：《雅克·比岱“元结构”视域中的“世界-国家”理论及其评价》，《东岳论丛》，2023年第2期。

步过渡到“世界-国家”这一新的“终极现代性”阶段,生态危机本身也已经呈现出许多不同于以往的、新型的资本主义危机的特征。因此,比岱认为,对当今生态危机所发生的时代划定“不应被理解为后现代性,而应被理解为终极现代性”①。具体来说,“终极现代性”指的是那种矛盾走向全面激化、波及全球的资本主义形态,其现实载体就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终极现代性”之所以使用“终极”(ulti-)这一词语前缀,其深层用意也在于刻画这种资本主义矛盾波及全球并走向全面激化的状态。在比岱看来,当代新自由主义生态危机已经清晰地展现出“终极现代性”危机的若干特征:

一方面,从地理空间来看,“终极现代性”指的是现代性危机扩散到整个星球尺度的全球属性。也就是说,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已经蔓延为一种全球性危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终极现代性”危局,现代性阶级结构的统治逻辑已经逐渐冲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引发全球层面的体系性危机。这种统治逻辑是以金融垄断资本作为支点的,正如国内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以经济控制、以金融垄断资本的世界性统治为基础的世界体系”②,金融资本宰制所导致的全球生态效应,则表现为在全球南北方不公正关系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开采和掠夺通过不断的商品化、金融化机制而向全球空间持续蔓延。当今新自由主义所构想的所谓环境治理“良策”,其实就是包括诸如碳市场在内的一系列自然普遍商品化和金融化模式③。正如比岱所言,“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转型加速了之前的趋势,其特点是采取异常激进战略,倾向于通过碳市场和气候风险证券化等机制将自然金融化”④。这一进程已经触及到地球本身的资源瓶颈和生态限度,从而导致生态危机扩散到“行星边界”这一终极尺度,并引发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生态灾难。

另一方面,从历史演变来看,“终极现代性”标志着现代性危机正在进入矛盾激化状态。资本主义社会历经数百年演变,其矛盾不断尖锐化,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走到了发生变革的前夜,而生态斗争恰恰可以作为引发资本主义制度变革的爆发点。实际上,西方国家试图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普遍市场化、碳交易等典型的新自由主义“自然商品化”机制来推进“绿色资本主义”,从而尽可能延缓生态危机对资本主义制度所施加的“催命符”。但是从根源上来说,由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终极现代性”“结合了两种破坏性潜力——资本家对‘职能者’的结构性控制,以及霸权国家对边缘地区的系统性征服,从而使人类文明达到了生态临界点”⑤。鉴于资本增殖逻辑与地球生态的自然限度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企图在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内彻底解决生态危机是根本不可能的,新自由主义社会试图在自身内部着手解决这种生态失序只会加剧资本主义制度的混乱。可见,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终极现代性”,意味着现代性危机已经进入矛盾全面激化的“临界状态”,只要再往前一步,就会跨越阈值,引发一场超越现代性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内爆”。这种“内爆”将会推动资本主义发生变革,激活人类社会走向生态解放的现实潜力。可见,通过“终极现代性”这一批判性语境,比岱将对生态危机的分析框定在现代性元结构的理论批判视阈之中,并印证了这种“元结构”范式对分析生态危机的适用性。

(三)生态危机新归因

对比岱而言,元结构分析范式不仅可以被用来剖析现代性危机下的诸多政治经济现象,更能对当代生态危机加以深层透视。他特别指出,透过“元结构”派生的“阶级结构”能准确把握当代生

①Jacques B. ,*A political ecology of common peopl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24,p. 128.

②宋朝龙:《边缘社会主义的起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③See Jacques B. ,*A political ecology of common people*,p. 103.

④Jacques B. ,*A political ecology of common people*,p. 101.

⑤Jacques B. ,*A political ecology of common people*,p. 87.

态危机的实质，“补全”以往生态批判理论所缺失的某些向度，并勾勒出生态解放所需要满足的现实条件。

比岱认为，以往西方左翼理论界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探讨，大多从经济层面入手对资本的运作逻辑展开生态批判，尤其关注资本盲目追求自身增殖所带来的生态恶果。然而，这种分析范式缺失了某种市场经济因素以外的、能够反映现实组织权力支配关系的维度。按照元结构理论，在元结构所生成的资本主义现代阶级结构中，除了资本家之外，还存在着职能者这一要素。比岱由此指出，在现实中造成生态危害的，其实不只是追逐剩余价值的资本家，还包括一些掌握专有技能或有资历的社会管理者，即职能者。无论是当今西方社会在经历“管理革命”所带来的资本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之后所产生的那些专门服务于资本利益集团的专业管理人员，还是在全球层面掌控并维持着世界经济不公正秩序的、奉行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某些国际组织与贸易协调机构，其实都与资本家一样，也会通过组织规划各种开发项目等活动，配合资本家实现对自然资源变本加厉的控制与掠夺，并引发严重的生态破坏。此外，苏联东欧的部分原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发生过的环境退化现象也说明，除了资本会对生态环境产生危害之外，确实还存在着某些其他的组织管理因素，同样会在现实中引起环境退化。

可以说，比岱提出的基于“元结构”的分析框架，的确可以解释我们所能观察到的一些环境问题。换言之，资本家所带来的生态恶果，只是道出了现代社会中生态危机叙事的一半，而这种危机叙事的另一半，则必须到现代社会中的各种统治管理形式或文化权力关系中去寻找。因此，如果要在当今发展一门具有批判立场的生态政治哲学，就必须同时关注资本家与职能者所带来的双重生态破坏效应，才能准确识别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找到一条解决生态问题，实现生态解放的现实道路。

二、生态解放的当代战略

自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的社会矛盾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分化态势。一方面，金融资本积累危机导致西方新民粹主义的蔓延，右翼保守势力把金融资本引发的制造业空心化、贫富分化和失业率居高不下归咎于族群、民族乃至国家之间的对立，以便利用民众运动的自发性转嫁矛盾和危机[①]；另一方面，西方新社会运动以来涌现出的一批新型的左翼社会斗争形式，使传统的工人运动逐渐向生态运动、女性主义运动等新形态转移。来自上述两个方面的张力，构成了解读当今西方社会运动演变的关键语境。特别是面对资本主义的强大统治机器，如何在左翼语境下统合碎片化的社会斗争，实现从“多元”到“一体”的转化与联合，以一种总体性战略对抗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推进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颠覆性变革，已成为当代左翼理论界所面对的一道“必答题”。透过近年来比岱在其论著中所给出的观点，一个可能的答案已经逐渐浮现——比岱认为，当代左翼变革战略的聚合点或许正蕴含在生态运动领域之中。如此一来，以生态运动为统领，凝聚并整合其他多元社会运动，就成为比岱反思当代左翼变革战略的关键所在。

（一）生态斗争与阶级斗争相结合

比岱生态政治哲学建构的一个标志性命题，是强调把生态问题归结为其背后所折射出的不公正经济政治关系与社会压迫形式。在《大众政治生态学》开篇，比岱开宗明义地指出，“对全球生态平衡的现代攻击完全源自一种社会统治过程”[②]。比岱认为，当代生态斗争仍然需要考虑阶级因素，

①参见宋朝龙：《西方新民粹主义逆全球化的囚徒困境与破解之道》，《理论与改革》，2020年第6期。

②Jacques B. ，*A political ecology of common people*，p. 2.

塑造一种“作为生态斗争的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s as ecological struggles)[①],即是说,当今谋求生态解放的现实斗争仍然不能脱离传统的阶级斗争。然而,比岱也意识到,随着西方社会出现“后物质化”“中产阶级化”等新变化,必须对这里的阶级斗争进行一种拓展性转写,才能准确把握当代阶级斗争的新形势。

针对这一理论任务,比岱将原先表达为劳资矛盾的阶级斗争,转写为一种大众反对统治阶级的“三边斗争”。如前所述,比岱认为,从元结构分析范式出发,我们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应当看到资本家“为了剩余价值而生产”所导致的生态恶果,还应当看到职能者的活动对环境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也就是说,除了资本家为追逐利润所进行的过度生产之外,作为现代统治阶级中的另一方,职能者也可以构成一种对大众的压迫形式,并引发严重的生态后果。因此,当代阶级斗争已经演变为一个包括资本家、职能者与大众三方的“三边斗争”。相应地,在这三者所形成的现代生态阶级结构中,当代生态斗争应当着力于同时反抗资本家和职能者的活动所带来的生态危害。比岱指出,这种斗争的长期发展会呈现出一种系统性趋势,即职能者会逐渐实现对资本家的控制,从而遏制资本家追逐利润所造成的生态破坏。而在此基础上,大众又可以逐渐实现对职能者的控制,从而限制职能者的活动对环境的破坏,逐步推进环境治理的民主决策。因此,按照比岱的设想,随着“三边斗争”的不断演进,不仅大众可以兑现其社会解放潜能,这种解放潜力还将反映在生态层面,即在消除现实阶级统治与压迫的过程中,推动西方社会逐步走向生态解放。

应当承认,比岱对当代阶级斗争与生态解放之间的关联性分析,确实展现出了一定的现实解释效力。但是,他把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生态解放的路径归结为大众在长期的“三边斗争”中战胜资本家与职能者这样的趋势性表述,却对西方社会中生态解放的领导力量,以及大众如何引领生态运动等关键问题语焉不详,因此在可操作性方面缺乏现实说服力。当然,比岱围绕从当代西方社会运动迈向生态解放所做的探讨,并不只是局限于对阶级斗争的思考,他还进一步关注到诸如女性主义运动、种族平权运动这样一些基于“非阶级因素”的社会运动对生态解放所能释放的现实驱力。

(二)生态运动与多元社会运动相结合

随着新社会运动以来新型左翼社会运动的崛起,以及社会斗争诉求的多元化,西方社会运动的总体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除了传统的阶级斗争继续存在外,西方社会还涌现出诸如种族平权运动、女性主义运动这样一些具有身份政治色彩的、基于“非阶级因素”的社会斗争。在比岱看来,这些社会斗争同样具有鲜明的生态意涵[②]。因此,当代谋求生态解放的抗争,不仅需要继续坚持阶级斗争,诸如女性主义运动、种族平权运动这样的社会斗争,同样对人类社会迈向生态解放具有促进作用,这些左翼运动也被比岱指认为“作为生态斗争的性别和全球南方斗争”(gender and Global-South struggles as ecological struggles)[③]。

那么,如何以生态运动为旗帜,推动多元社会斗争走向整合?一方面,比岱认为,生态运动本身具有联合其他社会运动的独特潜质。从长远来看,生态危机会对所有不分性别、不分种族的人类全体产生灾难性影响,这意味着环境利益已经成为当今人类社会广大成员之间的一种普遍的“共同利益”,可以成为耦合当代各种左翼社会运动的“最大公约数”。另一方面,比岱也意识到,虽然种族平权运动、女性主义运动从表面来看似乎与生态运动并无直接关联,但细致观察当今西方世界中的社会运动与生态运动,就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许多立场与诉求层面的交叠。譬如,女性主义运动与种族平权运动所反映的其实都是某种特定的社会压迫关系,这正是引发许多生态问题的根

①Jacques B. ,*A political ecology of common people*,p. 130.

②See Jacques B. ,*A political ecology of common people*,p. 2.

③Jacques B. ,*A political ecology of common people*,p. 139.

源。正如比岱所指出的那样，在第三世界对抗帝国主义自然资源攫取的斗争中就包含着鲜明的生态斗争意涵，这体现出种族平权运动与生态运动之间的关联，“在生态斗争的阵线上，反抗阶级压迫的斗争与反抗殖民压迫的斗争在路径上相互交织”①。而对于女性主义运动，从当今快速发展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潮就不难看出，生态运动无论是在思想还是实践层面都与女性主义运动存在紧密关联。可见，女性主义也已经成为一种“间接，但同样真实的生态主义”②。因此，当代多元社会运动中广泛存在的生态诉求，构成了生态运动整合多元社会运动的现实基础。而按照比岱元结构理论的解释，这些不同的社会运动之所以能够联合，根本原因则在于生态斗争与社会斗争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同构性——它们都力图反抗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由“元结构”倒置所转化生成的阶级结构及其不公正的社会统治形式。

应当看到，设想生态解放的当代战略，推动反抗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在当代实现从“多元”到“一体”的联合，构成了比岱生态解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从当代左翼社会运动之间的联合构思未来生态解放之路，却并非比岱对生态政治哲学演绎的终点。对比岱而言，人类社会迈向生态解放，最终必然需要建构一个“终极生态共同体”。而由于生态危机本身代表着一场深刻的、辐射星球边界的“终极现代性”危机，因而对这种生态解放共同体终极形态的探索，只有从社会斗争这样的国家层面上升到全球尺度，才可能得到合理的构想。

三、生态解放共同体的未来形态

比岱的元结构理论指出，对于人类解放的政治思考，只有在元结构所生成的阶级结构和世界体系的相互影响中才能展开③。换言之，人类生态解放的终极共同体形态，必须通过上升到全球层面才能找到答案。那么，应当是一种怎样的共同体形态，才能承载未来生态解放这一宏大目标？比岱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是通过反思与超越在当代理论界颇具影响力的“公地理论”，并深入阐发其所提出的“世界-民族”这一范畴的生态意涵而得以呈现的。

（一）公地理论的启示与局限

纵观欧美环境治理与公共政策领域，美国著名学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提出的公地理论被学界广泛认为是小规模自然资源管理的有效模型。作为一种公共事务管理理论，其目的在于发展一门基于共同体形式的自然资源公共管理学说，而这与比岱所要探讨的一种生态解放共同体的理论目标，显然是十分切近的。因此，比岱先是认可了奥斯特罗姆的公地理论对构想未来生态共同体的指导价值，继而深入探讨如何实现对这一理论的改造与升华。

在比岱看来，奥斯特罗姆的公地理论存在两大明显短板：其一，“公地”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存在着严重局限，其构架无法支撑对全球尺度的“终极现代性”生态危机的分析。也就是说，奥斯特罗姆的公地概念只适用于分析小尺度的微观社区自然资源管理问题，而根本无法用来设想宏观尺度上现代社会的生态解放，更遑论指导应对具有全球威胁性的生态危机。可以看到，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蔓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矛盾与不公正的统治压迫模式，早已溢出单一国家的边界而扩散到全球范围，生态危机也已成为一种全球性风险。正如元结构理论所指出的那样，“市场”与“组织”这样的现代性中介在全球层面的作用，正在塑造着“世界-国家”在全球层面的阶级结构，引发了新自由主义制度下全球南北方不公正的自然资源掠夺。而要对抗这些全球范围的体系性力量，仅仅依靠公地理论所关注的地方层级即村庄或社区这样的微观单元是不切实际的。奥斯特罗

①Jacques B. ，*A political ecology of common people*，p. 140.

②Jacques B. ，*A political ecology of common people*，p. 143.

③参见雅克·比岱，吴猛：《新自由主义及其主体：一个元结构的视角》，《哲学动态》，2016年第2期。

姆所提出的通过自由联合而实践的直接共同体,显然忽视了中介和阶级因素的存在[①]。除非奥斯特罗姆视域中的这些地方社区始终与世隔绝,否则就无力对抗这些全球性的结构化力量对微观社区的侵蚀与破坏。

其二,与这种概念运用尺度上的局限性相对应,公地理论的内在含义始终存在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排他性"意味。事实上,由于这一理论过于关注自然资源利用与组织模式的地方社区尺度,因而难以规避其意涵中的"排他性"色彩,而这是与构建全人类生态解放的未来共同体这一具有普遍包容性的宏大目标所不相容的。在比岱看来,公地理论所声称的对自然资源的共同占有,只是面向村庄或社区内部成员的"共同占有",而对那些被识别为社区以外的人来说,则是严格排斥的。因此,这种共同体"并非面向所有人的共同体,而只是对于一些人的共同体"[②],根本无法达到全人类共享地球自然资源所要求的那种真正的生态解放共同体的境界。

基于以上分析,比岱认为,人类生态解放的未来共同体形态,应当是其元结构理论链条中推导出的"世界-民族",而不是"公地"。相较于比岱所指出的公地理论在适用尺度和概念意涵方面的两个局限性,如果"世界-民族"这一范畴真正能够用来描绘未来生态共同体的形态,就必须相应地满足如下两个条件:一方面,这一概念必须超越"公地"意涵中所难以克服的特殊性与排他性,转而指向一种具有普遍包容性的全新概念意境;另一方面,这一概念必须能够适用于全球宏观尺度,从而能够用来探讨全球层面的生态危机与自然资源管理问题。那么,"世界-民族"这一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是否符合这两个条件?对此,比岱给出了进一步的论证。

(二)"世界-民族"作为生态解放的未来共同体形态

依照比岱的说法,之所以在"世界-民族"这一概念中沿用"民族"一词,是因为"民族"概念本身所揭示的正是特定民族共同体对具体领土的现实占有,也就是要吸收"民族"这一概念所蕴含的"领土共同体"意涵。当然,一个民族国家所拥有的具体领土对其他国家具有排他性,这是现代民族国家在资源占有方面同时展现出包容性与排他性的基本逻辑,即对民族共同体的内部成员展示出包容性,而对共同体以外的其他人展示出排他性。因此,使用"民族"概念的优势在于,可以吸纳这一概念针对共同体内部成员在资源占有方面的包容性与共享性含义。

然而,如何才能克服并超越"民族"概念内涵中的"排他性"?这其实也正是奥斯特罗姆"公地"理论所无力解决的问题。比岱给出的答案是将"民族"这一概念延展为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世界-民族"概念,使其真正成为一个能够表达未来生态解放的共同体含义的新范畴,这样就可以满足上面提到的"既消除排他性,又能够扩大到全球宏观尺度"的要求,也就是说,只有"世界-民族"概念才能真正"代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所阐述的公地的最终形象"[③]。比岱指出,"世界-民族"作为某种同一的"民族",既是许多以往民族的汇集,又不同于以往对民族的界定方式,是民族之间以及跨民族进程的产物,这种进程以新的民族或区域认同的形式出现[④],而在所有民族组成共同体的情境下,能够和平地、不受排斥地重新规划配置和利用自然资源。这种特征使我们可以把"世界-民族"作为某种面向生态解放的新型政治共同体。

推论至此,比岱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这种对全人类具有包容性,同时能够克服排他性的"世界-民族",会在现实中真实存在吗?在《大众政治生态学》中,比岱基于"元结构"范式对"世界-民族"出现的可能性进行了一种预言性推演。按照元结构理论,"世界-民族"这一设想之所以具有变为现实的潜力,是因为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由于作为元结构中介的市场逻辑与组织逻

①See Jacques B. ,*A political ecology of common people*,p. 161.

②Jacques B. ,*A political ecology of common people*,p. 161.

③Jacques B. ,*A political ecology of common people*,p. 150.

④See Jacques B. ,*A political ecology of common people*,p. 168.

辑的持续作用和世界性“三边斗争”的强力推动，世界的阶级结构和秩序正在从“世界-体系”过渡到“世界-国家”的冲突与动荡中不断向前演化。比岱认为，这种全球层面长期斗争的演化结果，必然是世界大众的觉醒与“世界-民族”的形成。基于当代世界阶级结构的变化和全球斗争形势的演变，可以推导出一种新自由主义世界朝向生态解放的潜在路径：反映掌控世界市场的资本家阶级利益的“世界-体系”，会随着体系中掌握世界组织权力的职能者阶级的不断壮大，而逐渐被形成中的“世界-国家”所取代；在此基础上，世界大众又能够通过控制这些世界统治阶级，从而在全球层面实现环境治理的民主化。经过这一历史进程，作为生态解放终极共同体形态的、由世界大众所组成的“世界-民族”，也会随之由理想变为现实。在比岱看来，随着“世界-民族”的逐渐生成，这种全新的人类共同体可以真正走上“从狭隘的民族团结到保护自然的普遍团结”的道路[①]，成为一种“终极生态共同体”。

虽然比岱对未来生态解放共同体形态的论证只是依循一种对全球体系未来发展的趋势性预测，但他通过给出“世界-民族”与“生命共同体”（a community of the living）等特定概念，指出了西方社会迈向未来生态解放的现实潜力与可能道路。这也意味着，只有在全球经济体系与全球政治体系之间的矛盾交织中，一股代表全球民众的、具有解放潜质的力量才能以“世界-民族”的形式得以汇集，从而实现对全球生态殖民和生态帝国主义霸权的制衡，逐步兑现通往生态解放的未来愿景。正如比岱所强调的那样，正是在全球范围内人类普遍解放的意义上，生态学现在可以被用来“描绘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人类的前沿”[②]。

四、结 语

比岱曾在《为了一门大众共同体的政治》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正在摧毁自然这一事实变得越来越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学的兴起唤醒了马克思主义”[③]。面对新自由主义时代开展生态批判与探索生态解放战略的时代任务，比岱依循其提出的元结构范式，通过近年来极具前沿性的政治哲学探索，已经基本搭建起一门符合当今西方左翼社会运动实况、且面向未来生态解放的左翼激进政治哲学。

值得注意的是，纵观当今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比岱对生态政治哲学的讨论，实际上可以回答当今生态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两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命题。

一方面，比岱对生态解放的理论探索，回答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构成一门政治哲学的问题。正如国内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不仅构成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生态环境困境或危机的系统性批判，而且指向一种特定而明确的绿色政治变革[④]。可以看到，政治哲学在当代已经逐渐构成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一种前沿形态，生态马克思主义也正在形塑“一种切近现实的政治哲学”[⑤]。然而由于学科分野所带来的既有隔阂，政治哲学与生态批判的融合长期以来缺乏具有严整构架逻辑的具体理论形态，处于一种“雾里看花”的模糊状态。而比岱通过提出现代性“元结构”范式这一分析框架，清晰地勾勒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可能的政治哲学表达形式，即“元结构”生态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随着气候变化、生物多样

①See Jacques B. ,*A political ecology of common people*, p. 75.

②雅克·比岱，陈喜贵：《现代性和全球历史》，《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1期。

③Jacques B. , Pour une politique du commun du peuple, Conférence à la Sorbonne le 16 octobre 2018, DESC-Direito, economia & sociedade contemporânea, Vol. 2, No. 2, 2019, p. 98.

④参见郇庆治：《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⑤阎孟伟：《生态问题的政治哲学探究》，《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性丧失威胁的迫近,比岱对生态政治哲学的搭建,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理论的与时俱进的发展,极大地推进了这一新兴学术领域的前沿探索。

另一方面,比岱回应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生态解放理论的迫切需求。生态解放是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关注的核心命题,也是生态社会主义思潮所探寻的思想归宿,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亟需建构的理论内容。虽然自法国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开始,法国左翼思想界就研讨生态解放问题,但其具体理论形式却一直处于一种不甚明确的状态。比岱对生态解放问题的思索和研究,从内在理论构建来说,是对其元结构思想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从外在理论应用来说,则是对生态解放问题相对完整的回答,无论在阐明当代生态问题本质层面,还是在推演生态解放的未来共同体形态方面,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与此同时,比岱在生态解放理论中对当代左翼运动相互联合的战略设想,也清晰地展现出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些重要特征,切中了新社会运动以来左翼所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

当然,必须承认比岱对生态政治哲学的探索也仍旧存在着一些局限。比岱将"世界-民族"设定为未来生态解放的终极共同体形态,这一构想在现实中恐怕是难以实现的。换言之,一种只具有包容性、不具有排他性的全人类"同一民族",或许可以在逻辑层面自圆其说,然而由于现实社会运动的动态性与复杂性,以及实施战略的模糊性,这种设想难免沦为一种不切实际的理论空想。再者,比岱建构生态政治哲学所运用的元结构理论本身存在缺陷,导致其建构方法受到影响,呈现出静态分析、抽象推理、机械类比等倾向,这些都程度不同地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具体的、辩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总的来看,比岱对生态政治问题的研究已经充分揭示出新自由主义环境治理的虚假性与片面性,揭露了"绿色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骗局,并预言了未来西方社会走向生态解放的可能路向。这些成果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理论在当今西方所能达到的思想深度与批判分量。尤其是比岱提出的"世界-民族""生命共同体"等概念,也说明当今西方思想界已然意识到,若要应对生态危机这一全人类所面临的挑战,必须共同秉持"同球共济"治理理念,进一步凸显人类社会的共同体意识,这一思路与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方案产生了高度共鸣。因此,面对全球生态危机,必须调动全球公众的能动性和积极性,以共同体思维大力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责任编辑:郑　毅]